

炒股亏了 当年老板如今街头拉琴



在街上拉琴



于夫在通远门租的房子里寻找灵感

他曾开饭店, 办公司; 他曾经挥金如土, 纸醉金迷; 而如今, 他靠在重庆解放碑街头卖艺为生, 生活必需的柴米油盐, 都成了他的奢侈品。虽然境况不佳, 但他却天天写诗、作曲。他说: “现在在我虽然一贫如洗, 但我的精神是富足的。”

如果没特殊天气, 于夫每晚都准时出现在解放碑附近一块空地上。他衣着整洁, 拉着自己喜欢的小提琴曲子。这样的日子已持续了一段时间, 常路过这里的人, 多数已习惯他那那闹市嘈杂湮没的琴声。

在街上拉小提琴

10月19日晚7点, 于夫照例出现在解放碑新世纪对面的人行道上。头发梳得油亮, 雪白的衬衫被扎在一条没系皮带的西裤里, 脚上的那双黑色足球鞋, 没有一点尘土和污渍, 琴箱里只有3.5元。他全神贯注地拉着曲子, 路上的行人大多远远瞟一眼, 便匆匆走过。

“拉得真好, 可惜不是在

音乐厅里。”一位白领女子弯腰丢向琴盒10元钱, 于夫边拉琴边目送那远去的背影。

华灯初上, 城里人的夜生活渐渐开始, 年轻的红男绿女们, 手拉着手, 向解放碑的大小娱乐场所涌去。于夫瞟了他们一眼, 深吸了口气, 理了理衬衣的衣领, 继续盯着琴弦, 忘我地拉琴。4年前他也常出没于那些地方, 但往事早已如烟。

过了零点, 街上的人渐渐少了, 于夫并没有停止拉琴: “我不是为卖艺而演奏, 而是要把自己的音乐与人分享。”此时, 他的琴声变得清晰起来, 并不流畅, 且有些沙哑。没多久, 他收拾行头准备回家。这一晚, 他收入20多元。

于夫在通远门租的房子, 两个房间堆满了杂物和办公桌。那台老旧的电脑, 摆在房子正中的矮凳上, 键盘需放在腿上才能使用。于夫没有睡觉, 而是用冷水抹了脸, 躺在一张简陋的钢丝床上, 微闭双目, 手指不停地在床沿敲打。躺了一会儿, 他猛地坐起来, 随手抓过一筒面条, 撕下包装纸, 用笔迅速地记录着。直到天亮, 他才放下一切, 酣然睡去。他说, 夜深人静的时候, 总会有一些曲子的

灵感在脑中闪现, 稍纵即逝, 所以要赶紧记录下来。

商场失意炒股亏了

其实, 于夫并非一直这样落魄, 他也有过自己的公司和资产, 按朋友的话说, 于夫虽没有大富大贵, 但足以小富即安。如果不是伙伴公司撤出重庆, 如果不是他炒股不慎, 如果不是那些朋友欠钱不还, 他完全可以过上相对优越的生活。

如今, 于夫每月都要抽一天去北部新区, 对他曾经的公司——“采金船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进行纳税申报。几年前, 于夫破产后, 公司就一直处于这种停滞的状态。除此以外的时间, 于夫全部用来写词作曲。生活虽然清苦, 但他十分满足: “比起商场上的尔虞我诈, 我更喜欢现在这样的日子。”

于夫是贵州山都水族自治县周覃镇人, 大学读的是医学专业, 毕业后在当地做了一名医生, 因不安生活在小地方,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他毅然下海。

初到海南, 一无所有的他, 在贴满招聘信息的招聘墙上, 找不到一个与他所学专业有关的工作。最后只好到一家窗帘厂当推销员。由于勤奋, 在海南打拼几年, 于夫很快成长为一

名出色的销售人员。经济宽裕后, 他开始投资开饭店, 2000年左右, 生意蒸蒸日上, 他却突然将饭店关闭, 和好友来到重庆开发旅游项目。好友但华章说, 于夫是个很有个性的人, 他喜欢创意和挑战, 做饭店, 琐事太多, 他不喜欢。

经过几年打拼, 重庆的业务大有起色。于夫记得, 那时, 每天就是陪客户吃饭喝酒, 一晚花费数千元并不罕见。2004年左右, 于夫另起炉灶, 开办了彩金船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是为一个朋友的公司做配套服务, 看起来一切顺利, 让他没有考虑到危机。可很快, 朋友公司撤出重庆, 他失去了主要客源。加之, 在权证上投资的失败, 外债又不能收回, 于夫陷入了危机。无奈之下, 他只好解散了员工, 对公司进行纳税零申报处理。

开始新的生活

落魄之初, 于夫想过不少办法, 想东山再起, 可终难如愿。最后, 他在公司剩下的办公设备中, 找了一些有用的桌椅、打印机等物品, 拉到了现在的住处, 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商场失意后, 于夫想起了曾在生活不错时, 写的《大陆人》那首诗, 其中有这样的诗

句“为什么心里有, 而手里一无所有; 为什么希望多, 而失望也许会越来越多; 为什么好梦只能在月光里寻求, 而不能在台风中等候”。他这才发现, 其实一直以来都在向往一种宁静的生活。于是, 他将精力转向写词作曲: “我发现, 只要写出一个像样的句子, 或找到一段不错的灵感, 都比每天挣一大把钞票的感觉更好。”

创作虽然可以找到快乐, 但经济压力很快到来。在手里的一点余钱消耗殆尽后, 不得已时, 于夫便向那些曾经欠他债务的人索要。现在于夫还保留着一个账本, 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别人欠他钱的数目。于夫说, 有些欠债的人, 如今早都无法联系, 他也不再追究: “我是个要面子的人, 撕破脸皮的事, 我做不出来。”只有少数人, 会适时地还他几千八百的资金, 于夫将其笑称为“资助”。钱虽不多, 但于夫过得坦然: “生活可以清贫一些, 但我有了更多创作的时间。”

为了省钱, 于夫有了第一次买菜, 第一次做饭, 第一次讨价还价的经历。有时为了能省几角钱, 他会在住处附近的几个菜场对比菜价。

19日下午4点, 记者在于夫家看到他正在做饭。只见燃气灶的火被开到最小, 锅里放着四五片肥肉。于夫不断用锅铲挤压肉片, 没有放油的锅里, 渐渐泛起了油亮的光泽。这时, 他抓了一把辣椒末撒在锅里, 一股呛人的油烟弥漫整个房间, 再炒一会儿, 他加了一碗水, 烧开后, 将面条下了进去, 这是他全天的第一顿饭。简单用餐后, 于夫拿起桌上的一把紫砂壶, 就着壶嘴吸了一口茶, 这些都是以前留下的东西, 也是他如今生活唯一的享受。

因音乐而快乐

到了去年冬天, 资金来源越来越少, 生存真正成了问题,

最艰难时, 甚至连米也买不起。不得已, 于夫想到有一次在朝天门练琴时, 有人在他的琴箱里放了10元钱。要不要上街卖艺? 他曾经有过犹豫。最终还是屈服于生活的压力, 将他创作的音乐在街市上演奏: “我并没有乞讨, 而是在与人分享我的作品。”

走上街头后, 于夫结识了一些朋友。如今, 重庆甘乐克斯数码公司负责人石军, 就是于夫不错的朋友。石军说, 在一次新华书店举办的知识讲座中, 早已落魄的于夫, 也专门赶去学习。会上, 他与于夫有过一面之缘, 简单聊了一下后, 发现于夫的经历与他有许多共鸣, 随后互留了电话: “我们都是白手起家创业, 现在各自的境况虽不同, 但个中艰辛,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今年4月, 涪陵英雄周波的事迹打动了于夫, 于是他决定要为英雄写一首歌。经过数天埋头创作, 词曲完成。可要制成真正的音乐, 还需演奏、演唱、录音等步骤。起初, 于夫找了一些相关的机构, 说明情况后, 希望对方给予免费帮助, 自然, 他被拒之门外。

于是他想到了那些萍水相逢的朋友, 打去电话后, 石军欣然接受了于夫的请求, 加上另外一些街头艺人的帮助, 《中国儿郎》MTV 最终录制成功。这首原创歌曲很快在网上走红, 于夫也找到了成功的快乐。

如今, 于夫依然过着清贫的日子, 依然坚持每天到解放碑拉琴, 除了有一些零钱的收入,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 愿意认真听他拉上一曲。甚至有两次, 两位女士还郑重地在他的琴箱里放上了两束玫瑰。在于夫卧室里, 两束花早已干枯, 但他依然珍藏着。他说: “我所追求的, 是很多人丢失的东西, 所以越显珍贵。”

据《重庆晚报》

女子救助站受辱 上诉5年仅赔千元

被伤害成精神病, 只得千元赔偿

一个五年前因在救助站受辱而精神失常的女人, 曾得到众多媒体的关注。但五年过去了, 诉讼的路来而复往, 公正的判决至今未临。

今年以来,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反复强调要“司法为民”, 要求各级法院“下大力气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案件中存在的司法不公问题……”

面对这样的案例, 基层法院有必要慎思笃行, 真正从每一例个案的审判上, 落实最高法院的“司法为民”宗旨。

45岁的薛宝玲被丈夫双手捆绑着坐汽车来到北京。2003年, 薛宝玲在南宁市救助站接受救助期间遭保安猥亵后精神失常。新华社报道后, 此事曾一度扭转。

但5年时光, 除了得到过法院判决的1000元赔偿外, 他们一无所获。5年时光, 因为无力接受系统治疗, 颠沛流离中, 薛宝玲从抑郁状态最终成了一个被鉴定为“智力为零”的精神病人。

2003年9月, 薛宝玲随丈夫王建国来广西打工, 途中钱包被盗, 两人无奈前往南宁市救助站寻求帮助。入住第五日深夜, 一位名为马兴发的保安先后三次进入薛宝玲宿舍当众对其进行长时间凌辱。

突如其来的施暴导致薛宝玲下身出血, 身体多处受伤, 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悲愤中的王建国决定报案, 被救助站领导想方设法降伏, 两人最后被简单安抚后送回老家。

然而返乡一个月后, 薛宝玲开始出现明显的精神异常。很多个晚上王建国会被薛宝玲的尖叫惊醒, 她会突然指着门说, “有人!” 王建国决定带妻子再返南宁, 要求救助站安排精神治疗。

救助站最初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在新华社发出报道后, 事情发生扭转, 医院决定接收薛宝玲, 广西壮族自治区龙泉医院作出精神病鉴定, 认定薛宝玲心理状态重度异常, 而且与被猥亵有直接因果关系。然而不到一个月, 因救助站停止支付医疗费, 医院被迫要求薛宝玲出院。

王建国再次前往南宁市民政局上访, 并向该局局长下跪。这位局长在无法劝说王建国离开的情况下, 叫来警察。正是这一场面的出现, 导致薛宝玲精神彻底崩溃, 她从此只会说一

句——“我没有犯法”, 惊恐交加的疯癫模样成为人们眼中的“疯子”。

在援助律师的帮助下, 王建国决定起诉南宁市民政局、南宁市救助站和肇事保安所在的保安公司。由于低估了薛宝玲的病情, 他们仅仅提出14600元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法院拒绝立案。2004年3月, 王建国前往最高人民法院上访后, 南宁新城区法院决定立案。

一个月后, 王建国请的律师获知肇事保安因猥亵罪被判三年, 因王建国夫妇未被法院告知开庭, 因此失去了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机会。

2004年5月, 新城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预付薛宝玲医疗费1000元, 其中南宁市救助站承担800元, 南宁保安服务总公司承担200元。所谓预付, 该案主审法官王志坚向记者解释, 就是先付1000元, 如果薛宝玲在继续治疗过程中费用超出这一数目, 可以再提起诉讼索要。

这位法官还进一步解释, 此判决和薛是不是精神病没有关系。因为原告没有提出精神损害赔偿, 也没有提供患有精神病的依据。

面对这个千元赔偿, 王建国不知所措。但又无法改变, 如果上诉就要提供薛宝玲的精神病鉴定, 如此上诉才有意义, 但他没有钱鉴定。一个偶然机会, 中国政法

大学数位师生义务帮助来京上访的王建国和薛宝玲代理上诉。他们的上诉意见认为, 作为救助站的主管单位, 南宁市民政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理应承担共同侵权连带赔偿责任; 预付的1000元医疗费用数额过低, 根本不足以支持实际的医疗费用。上诉提出了100万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请求。王建国和律师按规定时限递交上诉状后不久, 法院却以他们逾期未交纳上诉费用视为撤回上诉, 一审判决自动生效。一番上诉全部化为乌有。

“强劲”的审理, 衰竭的生命

靠微薄捐助和借债, 这对夫妇维持着最简单的生存。王建国一边竭力保证薛宝玲的药物治疗, 一边准备把官司打下去。在薛宝玲受辱三年之后, 上诉不遂的王建国被迫再回到这, 重新起诉。他并未预见到这将是一次更加漫长的精神折磨, 为此一点点丧失的是薛宝玲日益衰竭的生命和他对法律仅存的希望。

2006年6月, 作为原告的薛宝玲再次起诉, 提出共计73万元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然而直至今日, 这桩重新起诉的赔偿案至今没有开庭。

两年当中, 法院四次因故推开庭庭时间。从事发至2007年4年间, 薛宝玲进行的同级别司法、医学鉴定已达四次。四次鉴定

报告清晰无误地记录了薛宝玲因贻误治疗, 一步一步“疯掉”的过程。

对四次分别来自南宁、北京、西安、河南的省级医院的鉴定, 南宁法院方面均拒绝采信。2007年3月, 在法院人员的陪同下薛宝玲被用丝巾绑着双手带进位于上海的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一位鉴定专家见状生怜, 手持过往鉴定质问法院人员: 鉴定很清楚, 你们为什么还要折磨她!

这一最高级别的权威鉴定机构再次重申与过往一致的结论, 薛宝玲的精神问题与2003年的强制猥亵有因果关系, 同时认定她没有民事行为能力。鉴定尘埃落定, 王建国被告知2007年10月如期开庭。然而, 一如既往, 在开庭前几日, 法院再次借故推迟, 一下子推到了2008年3月。无可奈何, 王建国和薛宝玲畏缩在西安一处偏僻住所等待来年开庭的日子。

仍然是在开庭前夕, 王建国第四次接到法院的变更通知。这一次, 法院突然告知, 本案中止审理。王建国和律师大感震惊。法院告诉他们, 因南宁市检察院对5年前的判决结果表示不满, 认为当年判决让保安公司承担20%的责任缺乏法律依据, 遂向法院提出抗诉, 要求再审。因旧案再审理的处理结果是目前新赔偿案审理的依据, 法院由此裁定中止审理眼前的这

个赔偿案。

这个消息让王建国近乎彻底绝望, 他说, 不用被法院拖死, 他和薛宝玲的心已经快要死去。五年时光, 诉讼的路来而复往, 效率和效果全部为零。

10月16日, 北京永定门, 在专门接收各地申诉者的接济管理中心, 记者见到了薛宝玲和王建国。王说, 这将是她最后一次来北京寻求帮助。

和几年前相比, 薛宝玲胖了很多, 为她治疗过的医生告诉记者, 长期服用精神药物造成浮肿, 并会导致内脏重要器官衰竭。她不再说——“我没有犯法”, 而是被另外三个音节代替——“啧啧呀”——没有人能破译这是什么, 司法鉴定者反复倾听也无法辨清。

怕她夜里乱跑, 王建国在薛宝玲的手腕上系着红绳铃铛。她像初生婴儿一样躺在那里没有感知。这位四十多岁的女人曾经是国棉五厂能干的女工, 拥有一个四口之家。突然的劫难夺走了她的身心, 在余下的时光里, 她被陆续掏空成为一个没有智力和感情的人, 每隔五六秒, 如同一种怪异的鸟, 她就会冒出一句——“啧啧呀”——这忿忿而恐怖的声音在提醒外界, 她还活着。

10月19日, 转机似乎来临, 南宁法院人士向身在北京的王建国承诺, 将尽快审理该案。但愿这一次, 不会再让他们跌入失望的深渊。据《南方周末》